

中国古代“礼治”思想下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郑煦卓

(河西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是社会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力量。中国的服饰制度是将君权物化和神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统治者严格等级制度、确立身份地位、巩固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从夏、商、周三代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为了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逐渐确立起一系列服饰等级制度。本文从中国服饰制度的形成、“礼治”思想下的服饰制度以及汉代儒家思想对服饰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古代服装形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服饰制度;政治等级;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17-09

一、中国服饰制度的开端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是社会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力量。一个人有多少田产,出门能坐什么样的车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都取决于这个人在国家权力中所处的地位。政治权力的重要,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从夏、商、周三代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逐渐确立起一系列等级制度,不仅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而且在平时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严格规定。《易·系辞下传》中的“黄帝、尧、舜垂裳而天下治”,就把“衣裳”与“治天下”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服饰制度的制定意味着服饰与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制度大致出现于夏、商时期,直到西周时期才逐步完善确立,并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中。服装的形制从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这是将君权物化和神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统治者严格等级制度、确立身份地位、巩固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服饰制度从黄帝时期萌芽,到夏、商时期有了缓慢发展。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夏朝建立,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夏朝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当时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对服饰的演进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从古老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养蚕的直接记载。《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伏者,非亡之辞也……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先妾而后子,何也?曰:事有渐也,言事自卑者始。”反映了夏末殷初夏民族养蚕业的生产情况。《管子·轻重甲》记载:“昔者桀之进,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以上者。”说明夏代丝麻纺织手工业已有很

大的发展。从夏朝起,王宫里就有从事采桑养蚕的女奴。夏代的服饰制度在《论语》中有记载:“子曰,禹,吾无间然矣,恶衣服而致类黼黻。”由此可以看出,夏朝的创建者禹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但在祭祀之时,则穿着华美的衣服“黼黻”,以表示对神的崇敬。

公元前16世纪,商汤推翻夏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在商朝统治的500年间,尤其是盘庚迁殷后的270余年间,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进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朝的养蚕业、纺织业日益兴盛,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技术,能够在丝织品的表面织出许多精美的纹样,为我国以后几千年丝织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殷商一代,王室设有专管蚕事的女官。安阳殷商墓葬出土的俑人头戴帽、腰系带、衣有交领或对襟,贵族前有蔽膝下垂,袖成窄袖,衣上有边和绣纹,从俑的衣着上明显可以看出等级地位的不同。到西周时,政府设有庞大的作坊,从事服饰生产,并且在各部门设有专门管理王室服饰的官吏。

二、夏、商、周时期的服饰制度

夏、商的服饰制度为西周服饰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农业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农业生产品种的增多,桑、麻和染料作物产量逐渐扩大,为手工业生产尤其是服饰的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服饰密切相关的纺织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丝织品、麻葛织品和毛织品等服饰原料普遍出现。同时还掌握了各种染料的染色技术,染色也发展成为专门的行业。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奴隶主阶级不仅垄断了服饰原料,而且为了稳定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秩序,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服饰制度。

服饰制度出现以后,服装的功能除了蔽体之外,还成为“别上下,辨亲疏”的工具。可以通过服装的样式、衣料的纹样、服装的色彩和不同的穿着方式辨别人们分属哪一个阶层。从此,贵贱有差,服饰有别。上自天子公卿,下及士大夫庶民,在衣着上都有一套完整的体制与礼法,任何人不准僭越。随着夏、商、周统治的不断巩固与加强,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统治集团统治思想的不断演进变化,服饰的表现形式和穿着方式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由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通过体现阶层分明的等级制度,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穿着不同的服装款式,逐渐建立起一套服饰制度和管理制度,到西周时正式确立为十分严格、详细的服饰制度,从而开启了后世服饰制度的先河。

“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产物,包括社会生活、风俗、政治制度等方面。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伴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逐渐产生等级分化。统治者把“礼”与社会的等级差别联系起来,通过“礼治”来维护协调等级关系,稳定社会和巩固统治。“礼”从开始形成起,便体现着等级差别。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西周到战国时代,礼仪规定的服饰制度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多有记载。《周礼》,又称《周官》,主要记载有关西周王室的典章制度以及战国时代的各国制度。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但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周礼》的“周”,不是指周朝,而是周全完备之义,是战国时期对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总结汇编。

《周礼》中详尽地记录了掌管君王、王后、诸侯、命妇等人服饰的职官,以及掌管其他有关服饰的职官及其职责。《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衿射,则鹭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经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缙衰,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经。大礼、大荒、大灾,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鹭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宾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丧,共其复衣服、敛衣服、奠衣服、廋衣服,皆掌其陈序。”司服一职专门负责掌管天

子及诸侯在参加各种重大吉凶典礼时穿着的礼服,区别这些礼服的名称、种类和用途。

夏、商、周三代,在“礼”的思想影响下,祭祀是关乎国家社稷、国民生活、王室地位的大事,君王在举行各种祭祀大礼时,根据典礼的轻重不同,穿着不同等级的礼服。《周礼》是按照吉、凶、宾、军、嘉五礼来划分祭祀的性质,统治阶级的礼服依照五礼分为吉服、凶服、宾服、军服、嘉服。吉服分为六种冕服:大裘冕、衮冕、鹭冕、毳冕、希冕、玄冕。因穿着场合不同、穿用者身份地位的高低,不同等级的礼服,上衣下裳上面的“章”——图案纹样的数量不同,天子六服的冕相同。君王的礼服除了六种冕服外,还有用于兵事、视朝、田猎和参与丧事时所穿着的四种弁服:韦弁服、皮弁服、冠弁服、服弁服。丧礼时,天子吊服有锡衰、缙衰、疑衰三种,首服皆弁经。《周礼·夏官司马》中的弁师一职,是专门掌管天子诸侯穿着礼服和弁服所配戴的冠帽。书中记载:“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笋朱紃。诸侯之纁旒九就,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璜玉笋。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璜,象邸玉笋。王之弁经。弁而加环经。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弁经,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公、侯、伯、子、男等各级诸侯官员的礼服和冠帽的穿戴规范依据身份、地位的高低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僭越。

王后及内外命妇的服饰依据丈夫地位的高低,也有一定的等级。王后的礼服在祭祀、采桑养蚕、宴请宾客时配合君王的六种礼服分成袿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六种规格。内外命妇按照级别、地位的不同则分别穿着鞠衣、展衣、缘衣。《周礼·天官冢宰》中写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袿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凡祭祀、宾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衣服;共丧衰亦如之。后之丧,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内司服之“内”是指内宫,是后宫嫔妃居住的处所。内司服是掌管王后以及内外命妇所穿着的服装,与司服一职并列。王后和内外命妇搭配礼服的头饰也有不同的规格,分为副、编、次、追衡、笋。《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对追师这一职官的记载:“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笋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丧纪,共笋经亦如之。”这一职官主要掌管王后、九嫔及内外命妇头上的巾、冠、饰品。

这个时期男女穿着的鞋子是一样的,西周政府专门设有“屨人”一职,掌管天子和王后穿着的鞋子。《周礼·天官·冢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为赤舄、黑舄,赤纁、黄纁、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屨、功

屨、散屨。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屨”为单层底的鞋子,“舄”是双层底的鞋子,屨和舄的颜色与裳的颜色总是保持一致,与各种衣服配套穿着。

《周礼》中除了记载有上述掌管君王、王后、诸侯及内外命妇服饰的职官,还记有其他与服饰搭配和制作的各种职官及其具体职责。

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玉府负责掌管君王的金玉、玩好、武器、车辆、旗帜和各种珍贵物品的收藏,同时还要供给君王使用的“服玉、佩玉、珠玉”,燕寝时穿着的衣裳。司裘掌管着国家有关皮革方面的事务。制作大裘,供给天子祭祀时穿用之服。中秋向天子进献良裘,季秋进献颁赐群臣的功裘。负责供给君王和诸侯大射时的各种靶心,以及遇到大丧时用作明器的裘。掌皮是负责掌管每年皮革收集和分配的职官。典丝的职责是掌管蚕丝的收藏,辨别蚕丝的成色、价值,蚕丝的调拨和分配。典枲负责管理用来织布纺线的各种麻草的收藏、分配和颁赐。缝人负责王宫中缝纫衣服的职官,“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秋功,掌凡染事”。

《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对征集服饰资料职官的记述。角人是征集动物牙、角、骨的职官。羽人是负责征集各种羽毛的官员,“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掌葛的职责是掌管征集制作葛布的各种纺织材料。掌染草即“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主要负责征收各种可以用作染料的草类植物。

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服饰在“礼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周礼》中凡是涉及典章制度的实行,都有相关服饰的内容。如《天官·冢宰》中写道:“内宰……正其服,禁其奇邪,展其功绪。”“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说明这两个职位的官员都有端正后宫内廷服装的职责。阍人掌管守卫着王宫中门的门禁,防止穿着丧服、暗穿铠甲和奇装异服的人进入。据《春官·宗伯》记载,“小宗伯之职”包括“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典瑞是负责掌管各种玉瑞、玉器的收藏,鉴别其名称、种类以及用途的职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夏官·司徒》:“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大常。诸侯则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衮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秋官·司寇》中记述的“大行人”一职是负责掌管接待来朝诸侯及使者各种规格的礼仪。公、侯、伯、子、男各等诸侯前来朝觐的服饰、车旗级别有严格的规定,接待礼仪也有相应的规格。《冬官·考工记》中还记载有制作铠甲的函人、鞣制皮革的鲍人、负责绘画和刺绣的画绩、为羽毛染色的钟氏、负责涑丝

涑帛的幪氏、雕琢玉器的玉人等。

综上所述,《周礼》虽然被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很大程度上记载了西周的礼仪制度。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中,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为完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尊卑分明、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建立起一套严密完备的礼仪制度,所设职官种类繁多,等级划分明确,分工具体细致。特别是其中对穿着服装的性质、场合和规格等级的区别的严格规定,反映着统治集团“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的政治主张,服饰制度充分体现着以皇权为首的各级特权,并且借用这种特权稳固社会等级秩序,不容僭越。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制度

秦惠公元年(前 770),周平王从镐京(今西安沔水)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也随之改变。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逐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许多原本依靠周王朝生存的诸侯国强大起来,脱离周王朝的统治,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频繁发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春秋至战国期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的阶级力量开始崛起,加之奴隶制国家统治威信降低,“天”和“天帝”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也在削弱。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旧的等级制度和等级关系开始动摇,维护旧的等级关系的一系列的礼,自然也就遭到破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与此同时,诸侯逐渐强大,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深受其害。这一时期,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他们著书立说,游说各国,相互探讨,相互争辩,相互影响,极力宣传或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学术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诸子百家的不同思想,对当时衣冠服饰制度的制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儒家思想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约束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服饰制度和普通人的着装规范。

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实行礼制的社会。“礼”是为巩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礼法规范和行为准则。在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前,“礼”一直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人们的着装规范。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落,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礼治”渐渐走向崩溃。面对着“礼崩乐坏”的混

乱局面,儒家思想家以救世为己任,代表人物孔子认为,理想的和谐社会就是西周鼎盛时期的礼制社会,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概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儒家的“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们思想和言行的指导,即孔子提出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礼法规范和准则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礼仪要求来体现的。《仪礼》是儒家礼学的基本文献之一,内容涉及到整个社会活动,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礼仪规范和繁缛的程序,以及每一项仪礼中参与者具体的服饰规定。

中国早在氏族社会时期就有成丁礼,流传下来经过儒家的改造,形成冠礼。冠礼是古代男子的成年礼,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人生仪礼,备受人们重视。行过冠礼的男子,自此成年,社会地位改变,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仪礼》中记载:“士冠礼,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韦毕,即位于门东,西面。”为冠者举行冠礼之前,主人要先穿着礼服在庙门前占卜求卦,选择吉日。主人穿着的朝服,是当时祭祀或重大场合穿着的礼服。一般头戴黑冠,上衣下裳,腰束黑带,系白色的蔽膝。主持仪式的“有司”,包括宰、筮人、卦者、宗人、槟者、赞者等,都“如主人服”。然后“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邀请宾客来参加,“宾如主人服”。这说明冠礼的场面严肃庄重。冠礼当天举行仪式前要为将冠者准备三种服装:爵弁服、皮弁服、玄端。“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韦毕。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缁带,爵韦毕。缁布冠缺项,青组纓属于缺;缁绀广终幅,长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纁组纁边:同筐……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匱,执以待于西牀南,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

爵弁是古代男子冠的一种,规格仅次于冕冠,形似冕但前面没有垂下的珠饰。“爵”通“雀”,爵弁缁板外罩的细布颜色红中略带黑,如同雀头的颜色。爵弁服是配合爵弁穿着的礼服,纁裳,浅红色的裙子;纯衣,黑色的纯丝制上衣;缁带,黑色的带子;韎韐是赤黄色的蔽膝,是周代士一级职官在祭祀中所配戴的蔽膝,不同于诸侯、卿大夫礼服中所用的赤韐。

皮弁服早先是天子视朝之服,也用于郊天,巡牲、在朝、射礼等。后诸侯也可穿着皮弁服视朝、田猎等。皮弁也是男子礼冠之一,白色鹿皮制成,形略似后世的瓜皮帽。其造型特点为一个个凸起的竖棱组成,连接每一个凸起的部位名“会”,会上常有五彩玉饰,竖棱与玉饰的数量多少,与戴冠者的身分和所参加的仪礼规格有关。

素积指白色衣裙,上为细白布衣,下着多幅布缝成的白色裙子,裙腰捏出许多褶,俗称“积”。身系白色熟皮做成的蔽膝——素韦毕。

玄端是黑色的礼服,是中国礼服中贵重的一种。取正直端方的意思,故称“玄端”。玄端服搭配玄裳、黄裳、杂裳穿着。缁布冠是男子礼冠中所必备黑色布冠。古代习俗中男子成年行冠礼,加冠,第一个就是戴缁布冠,之后戴皮弁、爵弁,之后将头发梳成顶髻,去除缁布,即表示成年。这一规定是服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续通志·礼志》中记载:“明制缁布冠,亦为冠礼初加之服。”缺项是冠带上的环扣,用来固定冠。汉郑玄曾作注曰:“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纁,亦由固頍为之耳。”缺项上连缀着用丝编成的青色带子。纁纁:包头发用的黑色头巾,郑玄为《仪礼·士冠礼》注曰:“纁纁,广终幅,长六尺。”“纁,今之幘梁也……纁一幅长六尺,足以韬发而结之矣。”纁是戴冠时系于颌下的带子,一端系于笄,向下绕过颌,再上系于笄的另一端。士所用的纁是黑色的,镶有绛红色的边。郑玄注曰:“有笄者屈组为纁,垂为饰。朱纁。天子冕之纁也。诸侯青组纁;大夫、士当纁组纁,纁边。”

与不同的服装配套,举行冠礼时穿着的鞋子也有严格的规定。《仪礼》中写道:“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绀、纁、纯,纯博寸。素积自屨,以魁柎之。纁绀、纁、纯,纯博寸。爵弁纁屨,黑绀、纁、纯,纯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纁屨。”“屨”就是鞋;“绀”指鞋头上的装饰,有孔,可以穿鞋带;“纁”是鞋帮与鞋底相接处的缝里装饰的丝缕;“纯”为沿鞋口的镶边。夏天举行冠礼穿着用葛制的鞋子,冬天穿着皮制的鞋子,不能穿纁屨。纁屨是用制作丧服的疏而细的布料制成的鞋子。穿玄端服配合穿黑色鞋子,鞋头上的装饰,鞋帮与鞋底相接处装饰的丝缕,沿鞋口的镶边为青色的,鞋口的镶边宽1寸;穿腰间有褶皱的白裳,也就是皮弁服,穿白色的鞋,鞋的绀、纁、纯均为黑色,纯宽1寸;如果穿爵弁服搭配浅红色的鞋,绀、纁、纯也都是黑色的,纯宽1寸。

举行仪式时,将冠者穿着镶有朱锦边饰的缁布衣裳,用朱锦束着发髻出现。然后由长辈或来宾为其依次加上缁布冠、皮弁、爵弁,冠者换穿与冠配套的服饰。三次加冠后去掉最初的缁布冠,重新梳理成人的发髻,用巾把头发罩起来,再戴冠帽,将冠者就算长大成人了。冠礼之后的男子,可以参加社交活动,社会也要用成人之礼来约束他。在举行冠礼的整个过程中,参加人员站立的位置,如何行动,穿着的服饰,叩拜、作揖的次数,宴请嘉宾,赠送礼物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外,加冠者事先要到亲友

家去行礼,称作“告冠”;亲友前来送礼,称作“冠敬”。如果是孤子或是庶子举行冠礼还有不同的规定。

《仪礼》中的记载其他一些礼仪,如“士婚礼”、“士丧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礼仪中,也都有在举行仪式时对服饰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和要求。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也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选编了秦汉以前有关仪礼论着的核心内容。《礼记》一般被认为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所记录的,也包括了讲礼的古书。其中贯穿着儒家思想和学说,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许多关于服饰的规定,这是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中国人 2000 多年的服饰观念和风格。《礼记》在服饰方面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涉及面极广,区分得非常精细,不同的身份、场合、活动,甚至动作、表情都有具体的要求。严守礼教的服饰规制,成为中国人几千年传承的着装意识。《礼记》中对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记述,包括服色、质料的要求;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要求;度、量、数、质的不同规定;男女有别、文饰有差,内外(燕居与祭祀)不同等。“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要做到这些,则必须明确“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

在儒家思想中,对礼高度重视,由汉儒整理完成的《礼记》,发挥了孔子的精神,用礼来匡正天下,对社会政治进行改造,以期达到王道。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中心思想和制度,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统治阶级统治手段之一的传统服饰文化就必然体现“礼乐”精神。儒家坚持“服以旌礼”,依礼着装,等级有序,贵贱有别,是儒家服饰制度的显著特点。儒家还认为服饰从属于礼仪、适应礼仪的需要,参加祭祀、朝会、兵戎、婚嫁、丧葬等礼仪活动,应着相应的服饰。社会各阶层的等级序列和贵贱之别,通过服饰的质地、形状、尺寸、颜色、花纹等体现出来。

儒家礼教中特别强调“孝”,孝敬父母长辈和忠于君主处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礼记》记载的各种服饰规定中,有大量篇幅提到如何通过服饰来孝敬父母,包括日常穿着和父母去世时孝子的丧服制度。《礼记·曲礼上》记载:“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

不纯采。”作为人子,父母健在,冠饰和衣服的边缘不能用白色。如果父亲去世了,丧礼完毕以后,别的孩子穿衣没有特殊的忌讳了,但是嫡长子不能穿戴带颜色的冠饰和衣服或用彩色的衣服衣缘,以表示哀思,这是做儿子应守的礼制。“父母有疾,冠者不栉。”父母有病在身,成年的儿子不能梳头。

《礼记·内则》主要记载的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内部关系,其中对幼(晚辈)和女(妻)规定的更为详尽。如儿女孝敬父母的服饰礼仪,文中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缡,拂髦,总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未成年的孩子要在天刚有些亮、鸡啼鸣时起来,盥洗、梳发。缡是束发用的黑帛。拂去头发上的尘土,将头发梳成两个向上分开的发髻。其余头发分垂两边,下到眉际。“髦”指齐眉发式,用牦牛尾为之。汉代毛亨为《诗经》中所描述的“两髦”作传时专门注解为“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说明在父母身边孩子的发式要严格遵守礼教规定。衿纓是童子系在腰间的彩色丝带。容臭是装有香料的香囊,多佩在腰间。汉代郑玄注曰:“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唐孔颖达疏:“臭谓芬芳。臭物谓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修饰形容,故谓之容臭。”

“礼”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是起源最早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其他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转入了宗教,“礼”只作为“礼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在中国,“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礼记·曲礼上》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其中“道德仁义”指的是哲学伦理思想,“教训正俗”是习俗,“分争辨讼”是法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是政治人伦关系,“宦学事师”是教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是军事,“祷祠祭祀,供给鬼神”是宗教。这些思想、习俗、法律、政治、教育、军事、宗教等方面,都要由“礼”来主宰,没有“礼”,就失去了衡量标准。着装的礼仪也是礼的诸多规定中十分重要的一项,礼规定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服饰上的严格区分,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成为维护当时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有力工具,衣着的制度、等级决不能轻视和疏忽。

四、汉代的服饰制度

服饰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其发展、演变和主要内容、

特征均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政治制度则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基本制度,也就是处在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什么方式来实行统治。服饰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具有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包含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

中国的史书,从《史记》到《明史》,有二十四史之说。后来加上《清史稿》,被称为二十五史。史书主要记载一个朝代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以及重要人物。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服饰制度在历代史书中都有记载。《舆服志》首创于《后汉书》,是专门记载有关车旗、章服、冠履的规章制度和具体款式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记录了服饰演变情况的历史过程。《晋书》、《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舆服志》,《新唐书》中设《车服志》,与此类同。史书虽然多成于后代,但编撰史书一般不会相隔多个朝代,所以还是十分可靠的历史记录,因此二十五史中的历代《舆服志》是服饰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是研究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

封建王朝的舆服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历代的《舆服志》为我们记录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服制的演变历史,体现了中国服饰制度的重要性与规范性。二十五史中《舆服志》主要说明的是“分尊卑,别上下”的问题,这是统治阶层以“礼”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礼”是中国文化的总源,但是礼有古今之分。中国古代的“礼”,从原始的礼俗起源,在夏、商、周三代,是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旧有的礼仪制度被完全废弃。礼作为中国文化的总特征,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礼依托的社会生活消失,与之相应的文化不得不发生变化。礼有古今之分,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

春秋战国的变革,从政体的角度来说,是奴隶制向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古奴隶制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即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就是裂土分封,宗法制是把有血缘关系的人按照大宗、小宗的关系组合在一起,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结合,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依据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结构。在这个庞大而等级森严的结构中,忠君与孝亲、尊与慈、敬与爱、悌与友是完全统一的。这种关系贯穿在从天子诸侯到每个家族之内。古礼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春秋战国时期,宗

族和君臣关系的破坏与消亡,导致了古礼的消亡。

伴随着宗法分封制的破坏,治理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宗的事,权力更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天子或国君的手中,中央集权制形成。这种中央集权制不依靠宗法关系来提拔任命官吏、维持上层社会的人际关系。礼制的推行受到阻碍,法制更利于国家的治理。战国时代,古礼已经无法实行,各国忙于征战攻伐,无暇制定新的礼乐。秦始皇二十年(前221),秦统一全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古礼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秦代主要以法家思想来建立统治体系,但是并没有制定新礼,只是采用六国礼仪,把尊君抑臣的内容提取出来,来满足统治的需要。这种礼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要求,但是新礼未立,仍旧有古礼之名。

刘邦建立汉代,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社会基本安定,因此,重新制定礼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汉代从秦的灭亡中汲取教训,改变秦代不施仁政、专任严酷刑法造成的偏失,通过实行礼教来改变社会生活。汉代重兴制礼,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秦代实行严刑苛法,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秦的民众多为戎狄族,习俗本就“不与华同”,缺乏华夏的礼仪、礼俗的基础,商鞅变法彻底打散了大家庭的关系,“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①这样,礼制所依托的血缘关系失去了民间基础,父子兄弟之间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就为严刑酷法的推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六国不同,他们多为礼仪旧邦,社会礼仪礼俗积习很深,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家族伦理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秦统一六国,并不以六国的礼俗来治理六国,加之用秦法治理秦民,与其社会基础相适应,不易改变,用这种严刑酷法治理六国,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汉代建立,虽然承秦制,但是民间习俗多从六国,对六国的家族伦理关系及礼仪习俗,不但没有废除,反而更加提倡。从这一点来说,汉代重兴制礼势在必行。同时,汉初分封的诸侯势力太大,各行其是,没有严格的尊君礼仪就无法约束他们。因此,也需要制定严格的君臣礼仪制度来制约他们。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汉代制礼的呼声渐高,制礼活动也从应急措施转变为整体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对古礼的重新制作,相对于秦的恢复礼制,是维护国家统一,废除秦的暴政,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也反映了礼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汉初从高祖到景帝六七十年间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并立的局面,主要由三大流派构成,即法家思想、黄老思想、儒家思想。这些流派是对先秦和秦思想文化的继承。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并立的局面,建立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制度,影响了后来中国数千年的政

治制度。秦制的思想基础是法家,法家是先秦产生的一种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思想学说。刘邦建立汉代,接受了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体制,法家思想成为汉代思想文化的起点。虽然汉初承袭秦制,但是治国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先秦就已存在的一种古老思想,汉代从高祖到景帝时期,黄老思想是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方略。黄老之学是道家的分支和古老的黄帝之学结合而成,被称为黄老道家。黄老思想的约法省禁、清静无为、因循守旧和与民休息等,都在汉初的统治中有所体现。黄老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融合,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适时运用,带来了汉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汉初政承秦制,为汉代政治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但是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15年灭亡的历史教训,迫使汉初的统治者思考如何避免重蹈秦之覆辙,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问题,思想文化界兴起了一股“过秦”思潮。绝大多数思想家认识到秦代所施行的法家的严刑酷法有重重弊端,汉代如果想不蹈秦的覆辙,就必须加以改革。思想家们的改革方案主要是针对法家,显示出“归本于儒”的倾向。既然法家的严刑酷法导致了秦的迅速灭亡,而汉初实行的黄老思想与法家结合并不能解决严刑酷法的问题,只有选择主张德治的儒家,才能使汉帝国长治久安。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帝、景帝二朝采用贾谊、晁错的重农措施,到武帝时期,经济实力空前强盛。《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黄老思想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等政策带来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但不能持续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相反,它却刺激了统治者的欲望,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黄老之学适应了汉初有限皇权和三权分立政治格局的政治策略,使得贾谊之类的儒生被权力机构排斥,也是诸侯实力不断增长,对抗朝廷,甚至想取而代之的有悖于大一统的思想根源。随着诸侯王被消灭、抑黜,军功阶层的衰退,儒学的复兴,困扰和威胁汉初几十年的诸侯割据在武帝时期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汉初的军功阶层也被新兴的法吏、儒生阶层所取代。

随着汉王朝统治期的延长和自我意识的增强,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和成熟,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的制度势必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但黄老思想的因循无为却与这种普遍的政治期待相左。而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乐与法家的严刑酷法相比更显温和,汉代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它更能适应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从“政承

秦制”,以黄老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到“过秦”和儒学延续,汉初六七十年间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并立的格局。但是随着大一统政治的确立,儒学的优势越加明显,它逐渐成为适合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学说。

儒学是对古礼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古礼及其各个方面制约着儒学整体及其各个部分的发展方向,儒学与古礼有着大致相同的涵盖范围。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孔子创立儒学,使“儒”从一种职业转变成为一种思想学派,而孔子的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以为仁”,^②把宗教性质的原始之礼改造为包含人道精神的仁,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复兴周代的礼。在孔子看来,礼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完善自我的手段。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礼是超越刑罚之上的治国安邦之术,能维护既有等差而又和谐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家以救世为己任,最初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不完全是他独创而成,而是继承和改造了远古存留的学术文化。孔子之前,周代的礼与政教合一,周代的统治者是传统礼的制定者和实践者,用礼来统治臣民、教授子弟。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礼乐,另一方面又改造了它,他认为理想的和谐社会就是西周鼎盛时期的礼制社会。孔子所提出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他并不主张打破君主统治的体制,而是要求在道德(仁)的基础之上建立政治秩序(礼)。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仁和礼。孟子把仁的本性归结为善,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荀子着眼于礼,把人性归结为恶,与法家合流,把儒学固有的“君臣父子”等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荀子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将礼提升到自己学说的中心位置,对礼的论述最为全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他在对礼的起源上分析认为礼的兴起是由于物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求却是无限的,要满足人的欲求又不至引起社会的混乱,先王就制定了礼。把礼从个体的外在的规范上升到社会秩序、法度的高度,成为规范个人和社会的制度性的存在,由个体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

汉代的儒学偏向荀子的学说,它既改造了先秦儒学,也秉承了先秦儒学的一些特征。董仲舒综合儒家、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等诸多先秦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了一个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相互关联、影响、庞大严密的系统,说明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大一统世界存在的合法性和秩序性。董仲舒的这套理论,后人简明的概括为天人学说。董仲舒

的天人学说中,天是宇宙、人间万物的最高主宰,天与地、阴、阳、五行和人共同构成宇宙,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制约。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在君主之上树立了一个天的权威。天是宇宙人间所有秩序和本原和依据,君主必须遵循天的秩序和品性行事,否则就要受到天的谴责甚至惩罚。董仲舒主张施行王道政治,以仁为本,使用德治而不用刑治。尽管董仲舒的学说杂糅了儒、道、墨、法、阴阳等数家学说,但仍然以儒家为主,属于儒家学说,其根本原因就是仍然保留了仁在其学说中的优先地位,他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仁,建立了比之前儒学更严密的理论体系。他把天与仁、阴阳与刑德联系起来,把儒家一贯提倡的“仁”,提升放大到宇宙中来制约君主的权力。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以天的至高无上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把仁上升到宇宙的高度限制君权,同时也对加强君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作出了必要的论证。天人学说宣传“王权天授”,天为天父,君是天子,天与君的关系犹如父子之间的关系,只有君王才能沟通天,人民处于天之下,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于君,把人民的地位固定在君的权威之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儒家的“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董仲舒偏向荀子的学说,创立天人之说,进一步强化“君臣父子”的观念,儒家的“礼治”思想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们思想和言行的指导。

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都必须寻找或建立合法性的支持。权力和暴力在统治中虽说十分必要,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思想信仰上的统治。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统治者希望能够找寻到治国安邦的新方法,建立一种礼乐繁盛、以文辅德的有为政治。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倾向于儒学,儒学成为官学,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越来越和政治、法律道德相结合,成为统治手段的一部分。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文化的控制和转型,是汉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还是诸子、史学、语言文字学,甚至民间习俗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就衣着来看,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国力贫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老百姓,对服饰的要求都只是用来满足基本的需要,后来经叔孙通的说服,刘邦才命叔孙通制定礼仪。汉武帝时期,结束了黄老思想的统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之后,传统的服饰所体现的等级观念重新确立,服饰从此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与影响。服饰成为关系着帝

王统治能否得到“上天”承认的大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衣着直接反映着尊卑等级,若尊卑有序,则服制也应有差。班固在《白虎通·衣裳》中写道:“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绺纁蔽形,彪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作为身份和等级的标志,服饰制度化和礼仪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儒家学说的衣冠礼仪制度在中国开始全面贯彻执行。

《后汉书·舆服志》开篇就从以礼治国的统治观念来陈述,指出礼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尊卑有序,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昏暴陵之灾。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夫爱之者欲其长久,不惮力役,相与起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长久也;敬之者欲其尊严,不惮劳烦,相与起作舆轮旌旗章表,以尊严之。斯爱之至,敬之极也。苟心爱敬,虽报之至,情由未尽或杀身以为之尽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与天地比长。后世圣人,知恤民之忧思深大者,必殚其乐;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为之制礼以节之,使夫上仁继天统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谢。老子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之谓也。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尊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缙。”即社会各阶层必须严格遵守礼法制度,决不能以下越上,混乱法度。而作为政治制度重要内容的服饰制度,更要遵守“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原则。只有遵守这条原则,才算符合礼的要求,符合礼的要求才能达到上下有序,才能“报功章德,尊仁尚贤”。如果规定不合理或执行不严格,将意味着政权的动摇。

《后汉书·舆服志》主要记述天子在不同场合,如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稷等各种祭祀场合该如何着装。除了天子的各种装束,还有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诸王诸侯、公卿大夫、文武百官、朝野人士、侍卫、门生等在朝会、陵庙、祀天地、务蚕桑时的礼服,以及用于侍卫、出行时的服饰。具体描写服饰款式、色彩乃至纹样及其显示等级观念的重要性。例如文中记述中国服饰色彩和纹样的来源,描述的十分具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翬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旒,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绩,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纁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了秦汉出现的佩绶制度,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制度。周代君臣皆佩玉着袞,来区别尊卑贵贱。但因玉佩不是战斗兵器,蔽膝也不是兵器,所以战国时期“解去袞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⑬秦代“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⑭汉承秦制,用而弗改。秦汉之时的官服(上衣)其款式、色彩都相同,所以仅以衣着是不能区分等级的,而冠的区分又不十分详细,并不能准确无误地划分等级。绶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外,主要用来区分等级和地位的高低。通过绶的颜色之别、尺寸长短、花色纹样的不同来表示官吏的身份和等级,弥补了衣着和冠难以区分等级的不足。《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佩戴黄赤绶,长2丈9尺9寸;诸侯王戴赤绶,四采,长2丈1尺;诸国贵人、相国皆戴绿绶,长2丈1尺;公、侯、将军戴紫绶,长1丈7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戴青绶,长1丈7尺;千石、六百石戴黑绶,长1丈6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戴黄绶,长1丈5尺;百石戴青绀绶,长1丈2二尺。等级地位不同,绶的长度和颜色不同,地位越高,绶越长。同时,佩戴组绶在汉代也是一种礼仪,官员平时在外,将官印装在腰间的鞶囊里,绶带垂在外

面;在办理公事时,认印、认绶重于认人,这也是之后各朝各代的做法,成为我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实行礼制的社会,“礼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礼”是为巩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礼法规范和行为准则。“礼”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人们的着装规范。从早期服饰制度的萌芽,到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礼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出“礼”和“仁”为核心的学说,这种“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们思想和言行的指导。汉代的儒学改造了先秦儒学,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以天的至高无上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把仁上升到宇宙的高度限制君权,同时也对加强君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做出了必要的论证。加之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礼治”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礼治”思想统治下制定的服饰制度,在政治统治中极具重要性,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稳固政权、维护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注 释]

- 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周礼·秋官·司寇》。
《论语·八佾》。
《论语·颜渊》。
《仪礼·士冠礼》。
《仪礼·士冠礼》。
《礼记·坊记》。

《礼记·冠义》。

《左传·昭公九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⑪《史记·商君列传》。

⑫《论语·颜渊》。

⑬《后汉书·舆服志》。

⑭《后汉书·舆服志》。

[参考文献]

- [1] 华梅.人类服饰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2]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装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5] 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6] 王世铨.政治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7] 马润青.政治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8] 奚广庆.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 梁木生.政治学[M].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2.
[10] 张厚安.政治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11] 吴家荣.中国传统文化精粹[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
[12] 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 陈戌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5]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M].济南:齐鲁书社,2001.
[16]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8] 陈戌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19]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2]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3]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 万江红.中国历代社会思想[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5] 钱穆.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6] 林中坚.《礼记》中的礼乐与礼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4).